

“一带一路”对云南与东盟旅游 经济联系的影响分析

王桀 宋俊楷 孟帅康¹

(云南大学 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

中国旅游研究院边境旅游研究基地, 昆明 650500)

【摘要】: 云南是中国通往东盟的重要通道, 研究云南面向东盟国家的旅游经济联系和空间网络演化, 对建设“一带一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云南省及东盟十国的国际入境游客为研究对象, 运用旅游经济联系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 探究云南与东盟国家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规模以及空间网络结构演变趋势。研究主要发现: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 云南面向东盟十国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和规模均显著提升; 曾经的一个旅游经济网络中心(泰国)向外围扩散, 形成多个网络中心(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云南); 越南迅速崛起, 网络空间的辐射作用及扩展趋势超过云南。

【关键词】: 旅游经济联系 空间网络 东盟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2912(2021)03-0092-08

一、引言

“一带一路”提出以来, 云南与东盟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 对外开放步伐也全面升级^[1]。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下, 云南与东盟的合作不断加深, 旅游业纽带作用逐渐显现。2011年5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 提出支持云南省建设面向西南的重要桥头堡。“桥头堡”战略为云南省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也使对外旅游合作成为产业合作的重要方面^[2]。2013年, 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一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构想, 形成了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的新思路^[3]。伴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 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 边疆地区成为中国陆上开放的前沿。2015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云南省要依托自身区位优势, 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云南面向东盟从“桥头堡”到“辐射中心”的定位转变是从枢纽概念到综合中心概念的发展, 也是理解云南与东盟发展滞后的关键。

东盟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已成为“一带一路”研究中的重要区域^[4]。针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云南定位转变, 很多学者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出发, 认识到云南的区位优势, 但限于对象差异大、问题不聚焦, 对云南定位转变中经济考

¹**作者简介:** 王桀(1970-), 男, 云南大理人, 云南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旅游经济;

宋俊楷(1984-), 男, 河南封丘人, 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旅游管理;

孟帅康(1995-), 男, 河南漯河人, 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健康旅游与旅游经济。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边界效应转化与边境旅游失衡调控研究”(18BGL143), 项目负责人: 王桀; 文化和旅游宏观决策课题“澜湄跨境自驾旅游区合作建设研究”(2020), 项目负责人: 王桀

量和空间变化的认识并不具体。陈利君^[5]在“辐射中心”建设研究中提出,经济辐射中心是云南省发展的重点。作为毗邻东盟三国的旅游大省,云南旅游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周边国家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东盟之间的旅游发展也受到学者关注。例如,罗有亮等^[6]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框架下提出了云南与东盟各国旅游合作的路径。此外,姚梦汝等^[7]以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出境游客为对象,研究国家之间的旅游流分布和流动规律,对研究云南与东盟具体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提供了借鉴。因此,云南与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及其演化特征的研究可弥补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研究中研究视角的不足,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云南与东盟旅游经济的研究。

旅游经济演化研究可揭示区域旅游经济联系空间网络格局,在地理学研究中广泛应用^[8],但研究对象大多集中于省域、城市群及部分区域。董尊孟等^[9]从旅游经济联系和社会网络角度对新疆旅游经济时空网络进行探讨;侯兵等^[10]通过修正的引力模型对南京都市圈旅游经济联系演变进行探讨;杨丽花等^[11]对 2013 和 2016 年的京津冀地区的旅游经济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张凯和杨效忠等^[12]对环太湖地区的跨界旅游区机制进行了探讨。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部分学者将其应用于“一带一路”研究,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其中,邹永广^[13]通过旅游经济联系度和社会网络分析对“一带一路”主要节点城市的空间结构进行探讨。旅游经济联系和社会网络演变分别反映了区域内旅游经济发展程度和空间演变情况,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对旅游经济演化进行具体分析,为全面阐释国际区域发展情况提供了研究途径。

云南能否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本文基于旅游经济联系和网络空间演化的研究视角,选取“一带一路”建设前后两个时间点(2012 年和 2018 年)的旅游经济数据作为基础,通过旅游经济联系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测算云南与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和规模,展现云南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空间网络格局。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云南与东盟各国的旅游经济演化特征,对云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世界旅游组织(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是旅游领域的领导性国际组织,其发布的旅游统计数据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和权威性。本研究选取 2012 年和 2018 年云南省与东盟国家国际旅游人次和国际旅游收入作为基础数据,以代表“一带一路”建设前和建设后的时间截面。其中,东盟十国数据采用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的国际旅游入境人次(International tourism, number of arrivals)、国际旅游收入(International tourism, receipts)作为基础数据,来源于世界旅游组织出版的《旅游统计年鉴》、《旅游统计手册》以及相关数据资料 and 文件。区域之间距离数据,采用 Google 地图区域中心城市(通常采用省会或首都)之间直线距离进行测量获得。

(二)研究方法

1. 旅游经济联系模型

旅游经济联系模型是测度相关国家或地区(以下简称相关区域)旅游经济联系的模型。区域之间存在着以区域为载体的流量交换与转移,区域之间流量的联系紧密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区域间的交通距离和时间成本^[14]。本研究对引力模型进行修正,建立跨境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的公式:

$$R_{ij} = \frac{\sqrt{P_i V_i} \times \sqrt{P_j V_j}}{D_{ij}^2} \quad (1)$$

式中, R_{ij} 为 i 、 j 区域跨境旅游经济联系强度; P_i 、 P_j 为 i 、 j 区域国际入境旅游人次(单位:万人次); V_i 、 V_j 为 i 、 j 区域国际入境旅游收入; D_{ij} 为 i 、 j 区域间的距离节点空间距离, 采用的是相关区域中心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单位:km)。

跨境旅游经济联系规模为整个区域中所有相关区域经济联系度之和, 公式为:

$$C_{ij} = \sum R_{ij} \quad (2)$$

式中, C_{ij} 为旅游经济联系规模。

2. 社会网络分析法

社会网络分析法可以对相关区域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特征进行刻画。本研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 构建相关区域的旅游经济联系网络, 主要使用联系网络的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等测度指标, 以得出此区域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网络结构特点。

(1) 网络密度。网络密度主要衡量此区域相关国家或地区联系的紧密程度, 其结果为各节点区域实际存在的关系数量与理论上可能拥有的最大关系数量之比。国家或地区间的关系越强, 网络密度越大, 所体现的开放程度和获取资源能力越强^[13]。公式为^[15]:

$$D = \frac{\sum_{i=1}^k \sum_{j=1}^k \frac{d(n_i, n_j)}{k(k-1)}}{k(k-1)} \quad (3)$$

式中, D 为相关区域的网络密度, 且 $D \in [0, 1]$; k 为节点区域数量。

(2) 网络中心性。网络中心性可以刻画相关区域是否居于整个网络的中心位置, 通常使用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三个指标来反映和表现^[16]。

点度中心度是反映节点区域在整个网络中所处的中心位置和交际能力, 通常用相关区域直接联系的大小来表示。点度中心度越大, 中心性越强, 其与其他区域的交际能力就越强。其公式为:

$$C_{RD}(c_i) = \frac{\sum_j a_{ij}}{(n-1)} \quad (4)$$

其中, $C_{RD}(c_i)$ 为点度中心度, a_{ij} 为 i 区域与其他区域的有效关联数量。

接近中心度主要体现的是所求区域的通达性和与其他区域的紧密程度, 通常使用区域之间的最短距离来表示。其公式为:

$$C_{RP}(c_i) = \frac{(n-1)}{\sum_{j \neq i} d_{ij}} \quad (5)$$

其中, $C_{RP}(c_{ij})$ 为接近中心度, d_{ij} 为区域 i 和 j 之间的最短距离。

中间中心度表示为各个区域对网络中资源的控制程度。若中间中心度比较大, 则表示该区域对资源的控制能力相对程度上较强。其公式为:

$$C_{RB} = \left[\sum_{j < k} \frac{g_{jk}(c_j)}{g_{jk}} \right] / (n^2 - 3n + 2) \quad (6)$$

其中, C_{RB} 为中间中心度, $g_{jk}(c_j)$ 为区域之间最短距离的数量, g_{jk} 为区域 i 和 j 的最短距离的数量。

三、云南与东盟旅游经济联系

(一) 云南与东盟的地缘关系

作为中国连接东盟国家的关键节点, 云南在地缘关系上拥有与东盟国家交往的交通、文化优势。在交通上, 云南与越南、缅甸、老挝接壤, 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相连的重要纽带, 历史至今都具有重要交通价值。在越南方面, 云南历史上拥有交通相连条件, 建成连接昆明与河内的滇越铁路, 形成“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的奇观, 而今新的标准轨铁路和高速公路正在建立; 在缅甸方面, 云南修建的昆明与腊戍的滇缅公路, 长时间成为中缅联系的国际大通道, 现已进一步改造和提升; 在老挝方面, 云南不但加强双方建设, 与老挝各方建立联系, 而且建立连通泰国的昆曼国际大通道。在文化上, 云南少数民族众多, 与东盟交往频繁。由于文化相通, 云南与东盟接壤地区不仅有中缅边境“一寨两国”之景, 也出现中越边境“两国一城”现象。文化便利为云南提供了与东盟国家往来的文化优势, 加深了中国与东盟文化认同, 有助于国家之间的进一步往来。

作为中国面向东盟的开放前沿, 云南在地缘关系上拥有与东盟国家交往的地理、政策优势。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展, 云南积极借助地缘优势, 不断推进跨境旅游合作的发展, 倡导构建孟中印缅旅游圈, 积极推进滇西南澜沧江—湄公河黄金四角旅游圈、环中老缅泰四国黄金旅游线路建设等。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BCIM)、中国东盟“10+1”等国际合作机制框架下, 云南省积极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 建立健全了云南—泰北、云南—老北、云南—缅北、昆河经济走廊合作会议、GMS 经济走廊论坛、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等合作机制。

(二) 云南与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

根据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测算公式, 本研究测算了 2012 年和 2018 年云南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如表 1 所示), 可以发现: 第一, 2012 年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较高(强度大于 1, 下同)组合比较稳定, 2018 年强度较高组合增长了 1 倍。2012 年和 2018 年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均较高的组合为: 马来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泰国—柬埔寨、泰国—新加坡、越南—泰国; 2018 年新成长为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较高的组合为: 泰国—老挝、印尼—新加坡、越南—云南、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缅甸、泰国—云南。伴随着时间推移, 原有的“马泰组合”正在发生转变, 某些没有与马来西亚、泰国相关联的组合也成长为较高组合。随着旅游业带动效应和溢出效应的产生, “云南—东盟”区域的旅游业发展正在惠及更多的国家, “固定组合机制”正在演变为“扩散组合机制”。第二, 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总体呈现上涨趋势, 但增长分化严重。从 2012 年到 2018 年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变化来看, 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较高的马来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泰国—柬埔寨、泰国—新加坡、越南—泰国、泰国—老挝、印尼—新加坡、越南—云南、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缅甸、泰国—云南分别上涨了 0.924、1.159、1.854、1.176、1.165、0.795、0.47、0.616、0.314、0.808、0.526。“一带一路”开展以来, 不同区域从不同方面取得巨大发展, 但由于发展基础差异, 发展程度较高区域总体上增长大于发展程度较低区域。旅游业发展与开展旅游活动基础关联性大, 泰国、马来西

亚等发展基础优势大，故而与其相关联的组合和其他区域的增长分化严重。

表 1 云南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

2012 / 2018	云南省	越南	马来西亚	菲律宾	缅甸	老挝	泰国	柬埔寨	新加坡	文莱	印尼
云南省	—	1.271	0.146	0.049	0.124	0.102	1.014	0.073	0.088	0.001	0.039
越南	0.655	—	0.309	0.117	0.142	0.394	2.478	0.219	0.186	0.002	0.077
马来西亚	0.103	0.238	—	0.142	0.096	0.080	4.138	0.592	22.764	0.011	1.213
菲律宾	0.025	0.066	0.109	—	0.014	0.015	0.334	0.053	0.106	0.004	0.061
缅甸	0.025	0.032	0.029	0.003	—	0.049	1.021	0.040	0.052	0.000	0.020
老挝	0.046	0.199	0.054	0.008	0.010	—	1.500	0.073	0.044	0.000	0.016
泰国	0.488	1.313	2.979	0.176	0.213	0.705	—	3.839	2.009	0.014	0.591
柬埔寨	0.037	0.122	0.445	0.029	0.009	0.036	1.985	—	0.319	0.003	0.083
新加坡	0.056	0.131	21.840	0.075	0.014	0.028	1.324	0.220	—	0.010	1.463
文莱	0.001	0.001	0.009	0.003	0.000	0.000	0.007	0.002	0.008	—	0.006
印尼	0.019	0.042	0.899	0.033	0.004	0.008	0.301	0.044	0.993	0.003	—

注：左下三角形部分为 2012 年数据，右上三角形部分为 2018 年数据。

从表 1 来看，云南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在“一带一路”前后变化明显，呈现上涨趋势。在强度组合方面，2012 年与云南相关联的组合强度都较低；2018 年与云南相关联的两个东盟国家（越南、泰国）呈现出较高的关联强度。在强度上涨程度方面，泰国—柬埔寨上涨幅度最大，与泰国相关联的强度上涨幅度大，与文莱相关联的强度上涨幅度小，与云南相关联的强度上涨幅度处于中等水平。“一带一路”建设前后云南面向东盟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的变化反映了云南在滇越通道、昆曼大通道建设上取得一定成果，国际通道改善促进了旅游经济的发展。

（三）云南与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规模

根据旅游经济联系规模测算公式，本研究计算了 2012 年和 2018 年云南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规模（如表 2 所示），可以发现：第一，旅游经济联系规模排名变化不大。从 2012 年的旅游经济联系规模看，不同区域之间规模按照从大到小排名为：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柬埔寨、越南、印尼、云南省、老挝、菲律宾、缅甸、文莱；2018 年，仅缅甸排名提升 1 位，为第 9 名。由于发展程度的差异，旅游经济规模排名基本相似，菲律宾排名的下降更多来自于中菲南海冲突，导致自身旅游经济水平有所下降。第二，旅游经济联系规模大小都有所增加。根据 2012 年和 2018 年的旅游经济联系规模大小，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柬埔寨、越南、印尼、云南省、老挝、菲律宾、缅甸、文莱分别增加了 2.786、2.353、7.446、2.366、2.397、1.223、1.452、1.18、0.369、1.219、0.019。泰国的旅游经济规模增长迅速，比排名前两位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增加总和还要多，主要原因在于泰国旅游资源相对丰富、东盟的快速发展以及落地签、免签等旅游优惠政策的出台。第三，旅游经济联系规模所占比例有所调整。根据 2012 年到 2018 年的旅游经济规模所占比例，马来西亚减少了 5.91%，新加坡减少了 5.7%，其他区域的旅游经济规模所占比例都有所增加。作为老牌旅游大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旅游经济规模空间正在被泰国不断压缩，呈现出比例下降的趋势。

表 2 云南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规模

节点	2012			2018		
	排序	旅游经济联系规模	所占比例	排序	旅游经济联系规模	所占比例
云南省	7	1.455	2.01%	7	2.907	3.05%
越南	5	2.800	3.87%	5	5.196	5.46%
马来西亚	1	26.706	36.88%	1	29.492	30.97%
菲律宾	9	0.527	0.73%	10	0.896	0.94%
缅甸	10	0.340	0.47%	9	1.559	1.64%
老挝	8	1.093	1.51%	8	2.273	2.39%
泰国	3	9.493	13.11%	3	16.938	17.79%
柬埔寨	4	2.928	4.04%	4	5.294	5.56%
新加坡	2	24.690	34.10%	2	27.043	28.40%
文莱	11	0.034	0.05%	11	0.053	0.06%
印尼	6	2.348	3.24%	6	3.571	3.75%

从表 2 来看，云南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规模明显上涨，具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在规模排名方面，云南处于中游水平，一直处于第 7 名，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仍有较大差距。在规模大小方面，云南的增加值较大，超过了规模处于其前面的印尼。在规模所占比例方面，处于前两位的所占比例有所下降，而排名较后的区域所占比例有所上升，所占比例的调整为云南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一带一路”建设前后云南面向东盟旅游经济联系规模的变化反映了该区域发展条件的进一步变化和云南整体规模的提高，东盟发展与云南建设推动了整个区域融合，促进了该区域差异进一步缩小。

四、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结构演变

(一)网络节点变化趋势

本研究通过设置断点值将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矩阵转化为二分矩阵，使用 Ucinet6.0 软件绘制了 2012 年和 2018 年云南面向东盟的旅游空间网络结构图。考虑到网络结构可对比性以及数据可适用性，取断点值为 0.05，即强度大于或等于 0.05 时，取值为 1；强度小于 0.05 时，取值为 0。在形成 2012 年和 2018 年二分矩阵的基础上，本研究以 NetDraw 作为辅助工具，绘制了旅游经济联系空间网络结构图(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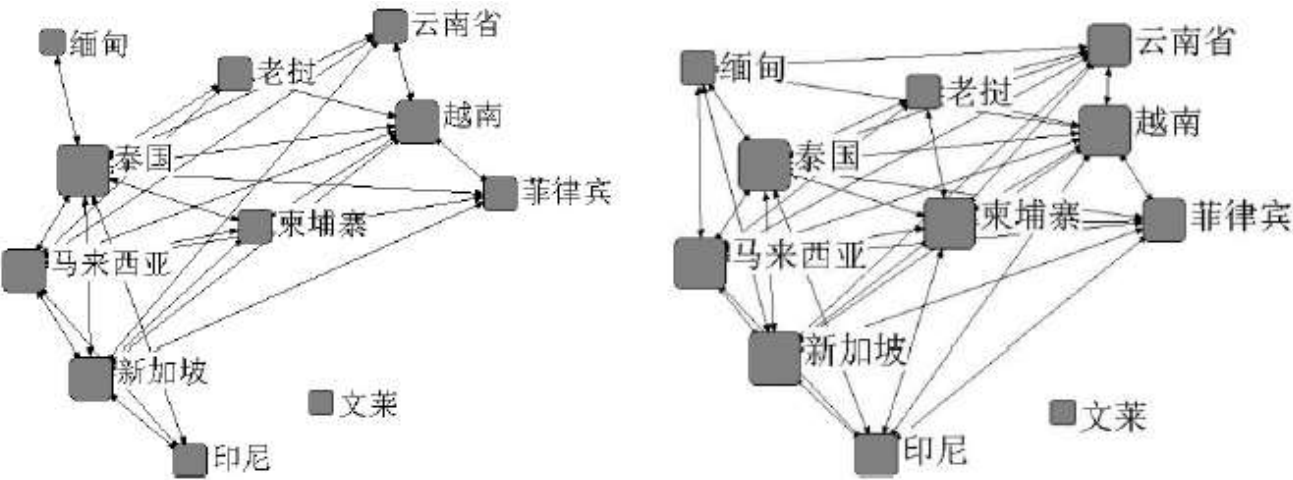


图 1 2012 年、2018 年云南面向东盟的旅游空间网络结构

图 1 展示了 2012 年和 2018 年云南面向东盟旅游空间网络结构图。从中可以发现:第一, 2018 年比 2012 年的旅游空间网络结构更为复杂。从 2012 年到 2018 年的节点连线数量来看, 除泰国和文莱以外, 其余节点的连线数量都有所增加。泰国与除文莱以外的所有节点都有连线, 处于已经饱和状态;而文莱的体量太小, 与所有国家都没有连线。连线数量的增加使网络节点的联系更加紧密, 也使网络结构更加复杂。第二, 2018 年的旅游空间结构网络已从“单中心网络”变为“多中心网络”。2012 年仅泰国处于网络结构中心, 其他区域围绕着泰国进行发展;2018 年马来西亚、越南也成为网络中心, 新加坡与云南省成为辐射中心, 多中心格局已然形成。泰国处于东南亚地区的地理中心, 与其他东盟国家联系密切, 与云南省也有密切的联系, 是“云南—东盟”区域的“旅游中心极”。伴随着旅游经济扩散发展以及旅游基础设施的改善, 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云南的发展潜力逐步显现, 正在成长为新的旅游经济发展中心。

(二)网络密度变化趋势

根据网络密度的测算公式, 本研究计算了 2012 年和 2018 年云南面向东盟的整体网络密度, 可以发现:首先, 整个区域的密度环境不断改善。从理论上讲, 一个由 11 个节点区域组成的网络结构最多存在的关系数为 110 个。在整体网络结构中, 2012 年和 2018 年实际存在的关系数分别为 50 个和 72 个, 关系数呈现明显增加。伴随旅游经济不断发展, 区域之间的联络便捷性增加, 有利于培养更加紧密的网络结构。其次, 整个区域的网络关系紧密度在不断提升。在整体网络结构中, 2012 年和 2018 年的网络密度分别为 0.455 和 0.655, 上升了 0.2, 增幅为 43.96%。网络密度不仅获得增加, 而且增幅大, 相互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三)网络中心变化趋势

采用 2012 年和 2018 年的云南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矩阵, 本研究通过 Ucinet6.0 软件测度了 11 个区域旅游网络节点的中心度, 包括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如表 3 所示)。

表 3 云南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网络中心度

节点区域	2012			2018		
	点度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	点度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
云南省	0.400	28.947	1.182	0.700	31.429	1.182
越南	0.700	31.429	3.727	0.900	33.333	3.727
马来西亚	0.800	32.353	3.727	0.900	33.333	3.727
菲律宾	0.400	28.947	0.000	0.600	30.556	0.000
缅甸	0.100	26.829	0.000	0.500	29.730	0.000
老挝	0.300	28.205	0.000	0.500	29.730	0.000
泰国	0.900	33.333	3.727	0.900	33.333	3.727
柬埔寨	0.400	28.947	2.000	0.800	32.353	2.000
新加坡	0.700	31.429	2.000	0.800	32.353	2.000
文莱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印尼	0.300	28.205	0.000	0.600	30.556	0.000

表 3 展示了云南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网络中心度, 可以发现:第一, 2012 年仅泰国处于核心位置, 2018 年泰国、越南、马

来西亚均具备核心能力。在点度中心度中,2012 年仅泰国的数值处于最高值;2018 年点度中心度处于最高值有泰国、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柬埔寨、云南省的值次之。在“云南—东盟”区域,2012 年到 2018 年具备核心能力区域的数量在增加,新加坡、柬埔寨和云南省处于次中心位置,发展潜力巨大。第二,泰国控制能力下降,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云南省控制能力上升。2012 年,泰国处于控制地位,其他节点处于被节制地位;2018 年,越南、马来西亚均具备控制能力,使泰国控制能力下降,也使新加坡、柬埔寨、云南省被节制作用降低。第三,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新加坡、云南省中介作用比较稳定。从 2012 年和 2018 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发挥中介作用的节点均为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新加坡、云南省,与处于核心位置的节点相一致。

五、结论与建议

“一带一路”建设以来,云南与东盟国家的旅游交往持续扩大,旅游经济联系从空间、范围和影响方面来看,均得到显著加强。旅游经济联系是“一带一路”中“民心相通”的保障因素,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提升性因素。借助地域优势和“一带一路”建设契机,云南具备了成为中国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辐射中心”的地位。然而,2018 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增速放缓为 11.2%,云南与东盟前十个月贸易额增速跌为 7.8%,云南增速远低于全国。云南增速的偏低突显了辐射中心建设的滞后性,迫切需要寻求进一步突破,来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发展。

一是云南需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需要推动免签制度升级,扩大云南开放力度。昆明作为云南面向东盟的中心城市,是云南“辐射中心”定位的主要推动者和践行者,也是旅游经济发展的中心。从近年来的昆明入境游客结构分析来看,现阶段国际入境旅游小众化、团体化发展依旧较为普遍,以旅游为主要目的入境游散客量增长并不突出。主要原因在于:相比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推出的利民签证措施,我国入境签证手续相对比较繁琐。建议在将 72 小时变为 144 小时过境免签的基础上,继续推动“第三方过境免签”,促进出入境便利化,以便吸引赴东南亚地区的入境旅游通过昆明入境,促进云南昆明入境旅游发展。

二是云南需要强化跨境旅游合作。作为与多个东盟国家接壤的省份,云南具有天然的跨境旅游合作优势。在“两区”建设的大背景下,云南应加快推动中越河口—老街、中老磨憨—磨丁、中缅瑞丽—木姐三个区域的边境旅游试验区建设,增进双边、多边互利互惠的交流合作,为更大范围跨境旅游合作打下坚实基础。在“两区”建设基础上,云南应推进沿边旅游城镇及口岸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实现口岸管理协调服务的一体化,吸引旅游者口岸从事跨境旅游活动。此外,云南与东盟国家的旅游院校、科研机构可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开展联合办学,利用各自优势教育资源开设跨文化、跨语种旅游相关专业,丰富旅游人才培养体系,相互输送优质旅游管理人才。

三是加大云南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旅游是加快云南与东盟国家合作的优先领域,也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动方式。为加快“一带一路”西南方向的建设步伐,云南应把“云南—东盟旅游圈”打造成为“一带一路”主要旅游目的地,建设若干条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跨境旅游黄金线路。此外,云南应加快推进旅游大数据中心和网络交易平台建设,鼓励有条件的旅游企业、机构“走出去”开拓市场,引进一批国际知名的健康服务、赛事运营等旅游知名企业,参与云南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产业整合,以实现区域各国边境地区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参考文献:

[1]吴磊,曹峰毓.云南对外开放的历史透视、问题与出路[J].思想战线,2018,44(03):83-93.

[2]罗有亮,田志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云南旅游业发展思考[J].经济问题探索,2011,33(12):135-138.

[3]陈昕.“桥头堡”战略视阈下的云南对外旅游合作研究[J].管理世界,2013,(05):184-185.

-
- [4]梁经伟,文淑惠,杜洪燕.“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联动关系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6,35(3):5-10.
- [5]李智环,邵媛媛.论跨境民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示范作用——基于云南的思考[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6(04):89-93.
- [6]谷亚华,吴霓,古文凤.论“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安全与双语教育[J].民族教育研究,2017,28(05):73-76.
- [7]张晗,刘江.“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跨国共生社区建构——以云南弄贺傣族村为中心的探讨[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3):7-13.
- [8]王林,李晓霞.“一带一路”战略与云南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J].思想战线,2015,41(03):116-119.
- [9]吕文利.论云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定位——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视角[J].云南社会科学,2015,(04):83-86,97.
- [10]余江英.试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云南关键语言选择[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7(S2):137-141.
- [11]陈利君.云南建设辐射中心的内涵与对策建议[J].云南社会科学,2015,(06):1-6.
- [12]陈睿山,叶超,蔡运龙.区域经济联系测度方法述评[J].人文地理,2013,(1):43-47.
- [13]刘佳,李莹莹.国内外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旅游研究综述与启示[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6,32(09):1134-1138,1147.
- [14]张凯,杨效忠,张文静.跨界旅游区旅游经济联系度及其网络特征——以环太湖地区为例[J].人文地理,2013,28(06):126-132.
- [15]杨丽花,刘娜,白翠玲.京津冀旅游经济空间结构研究[J].地理科学,2018,38(03):394-401.
- [16]于谨凯,马健秋.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格局演变研究[J].地理科学,2018,38(11):1875-1882.
- [17]侯兵,黄震方,范楚晗.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演变与思考——以南京都市圈为例[J].人文地理,2013,28(05):94-100.
- [18]徐东波,刘雅珍,孙若涵.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9,000(001):119-126,138.
- [19]邹永广.“一带一路”中国主要节点城市旅游的经济联系——空间结构与合作格局[J].经济管理,2017,39(05):22-35.
- [20]董尊孟,李晓东,李偲.新疆旅游经济网络结构演变及驱动机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8,37(05):106-111.
- [21]于洪雁,李秋雨,梅林等.社会网络视角下黑龙江省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和空间发展模式研究[J].地理科学,

2015, 35(11):1429-1436.

[22]李娜, 伍世代, 代中强等. 扩大开放与环境规制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 经济地理, 2016, (11):109-115.

[23]万永彬.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19(11):134-141.